

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

张亚光 毕悦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极具历史自觉和战略前瞻性的主动选择。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先后经历了萌发、探索、建构3个阶段,完成了“中国式”选择从历史自觉、实践自觉到话语自觉的转型;并在新时代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表现为水平上从低位追赶到高位引领的提升、路径上从“先破后立”的老路到“破立结合”的新路的转变、方法上从局部管理到系统治理的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成就得益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人民首创和人的现代化本质目标相促进、战略目标和底线思维相统一、独立自主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相融合。未来在实践维度上,应着重把握好长期与短期的张力,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机融合,提升引导和利用资本的能力;在理论维度上,应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概念、指标度量和话语体系构建,持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探索历程;实践经验

【作者简介】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出处】《管理世界》(京),2023.1.41~55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基金号:15ZDB131)的资助。

一、引言

作为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概念,现代化构成了数百年来世界各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向,它既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罗荣渠,1994),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工业化、城市化,乃至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等各方面理想形态的规定(亨廷顿,1998)。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从被迫卷入和适应世界性浪潮,到尝试建构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方案,直至提出超越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其进程之紧凑、成就之显著,为世界所瞩目。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

2022)。在此后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中国式现代化”均被反复提及,并被赋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等更高的世界历史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原则的一次最为集中的阐释,既凸显了其对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历程的主线意义,更指明了未来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新高度的方向与路径。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关注和讨论,构成了横纵两条鲜明的学术经纬。从纵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从属于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救亡运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并随着实践演进,展现出迥异的阶段性特征(张来明、侯永志,

2021;胡鞍钢,2022;燕连福,2022);从横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道路唯一性的成见,颠覆了由资本逻辑和“丛林法则”主导的旧文明秩序,建构起既包含现代化一般属性、又具有中国风格的新文明形态(吴晓明,2017;刘守英,2021;臧峰宇,2022)。此外,作为一个极具综合性的学理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又必然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重大战略或目标发生密切联系(周文、肖玉飞,2021;洪银兴,2022;王灵桂,2022;郭晗、任保平,2022)。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探讨中,一个核心的问题较容易被忽视: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被选择的?这其中自然有多种复杂的客观约束,致使中国在近现代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却均告失败(罗荣渠,1993),而不得不尝试开辟属于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式”是一种具有强烈历史自觉和战略前瞻性的主动选择。在实践意义上,这种主动选择驱使着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至今,都深耕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考察,即使面对重大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也始终致力于将有限的资源重组盘活,而没有重蹈东欧、拉美的覆辙,倒向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在理论意义上,这种主动选择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构造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多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方案,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关键问题。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90年历程,从萌发、探索、建构3个阶段,完整考察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被创造和坚持的,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典型特征;第二,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现代化的“中国式”如何超越此前历史和已有的现代化模式,构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成就和举措,探讨现代化的“中国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第四,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未来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着重把握的3个方面、重点研究的3个领域,为开辟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境界提供借鉴。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历程与特征演进

(一)萌发阶段(1921-1949年):“中国式”的历史自觉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1. 摒弃西化和苏化,倡导第三种方案

现代化概念最初传入近代中国,是与“西化”“欧化”等含义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早在19世纪80、90年代,有关现代化的英文词汇就已频现于《北华捷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在华英文报纸(黄兴涛、陈鹏,2018),并大多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西方文明改造落后中国的愿望。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苏俄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国家干预的出现,知识界对现代化图景的勾勒更为多元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3年《申报月刊》发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为进一步聚焦问题导向,该刊特别要求学者讨论中国现代化应走西欧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特辑收录的26篇文章中,完全赞同其中一种道路的文章并不多见,而支持两种道路融合的观点则占据大半。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了该制度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合理性(张良辅,1933);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孱弱,又使得照搬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太超时代、太鲁莽(董之学,1933;谷春帆,1933)。基于西化和苏化的不可行性,有人提出了“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的第三种方案设想(张素民,1933)。尽管上述方案仍显粗糙,也未必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早期构想。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突出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诉求,即必须选择一条符合中国条件的现代化道路,“离开了中国的经济现状来谈生产发展的路线,那恰是闭门造车的乌托邦理想”(董之学,1933)。

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群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具有天然的批判意识;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极为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与当时的“标杆”苏俄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力渗透下被迫开始的,因而其现代化政策必须“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李达,1980);另一

方面,外力的入侵也“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毛泽东,1991a),而是要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故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内容(赵士发,2016)。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透彻认知,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关键的思想基础。

2. 推行土地革命,进行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土地革命时期,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运动后,首先通过土地革命开启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尝试。尽管以变更土地秩序的方式获得现代化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并非中国道路的首创,而早在英国圈地运动和俄国农奴制改革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但近代中国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又有其特殊性。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约4000万户以上,超过全国人口的70%;有地农民仅占45%,其中又有32%的地主、富农占据了81%的土地总量^①。除封建土地关系外,来自全球市场的侵袭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凋敝状况。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决定了推行土地革命不仅是党动员最广大的革命力量、打开中国革命出路的政治运动,也是将经济剩余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手中剥离出来、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现代化运动(何二龙、孙蚌珠,2022)。1928年,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完成了土地国有化的局部实践;1937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促使党调整了土地革命的既定节奏,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了减租减息的新政策;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分批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土地革命之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1991c)。

不过,土地革命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自发开展。1929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要使农民懂得共产主义必须要农业工业化。”而

土地革命将原来集中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散给小农耕种,这种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恰恰阻碍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应用,许多农民仍然缺少足够的生产工具。鉴于此,苏区中央政府于1933年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随后又鼓励农民建立犁牛合作社,通过自愿集资入股、生产资料公有的形式开展联合;同时,针对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状况,在瑞金设立农事试验场,要求“尽可能地提前提出各主要农产物的培植、防害、施肥等改良方法,来供给中央土地部,以指导各地”(谢绍武,1934)。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贯穿了此后党的根据地建设,并随着局势调整不断扩展向全国。1933年、1934年,中央苏区在极端困厄的外部封锁下,分别实现了粮食产量15%、10%的增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解放区的互助合作保证了农村10%~15%缺少劳动力农户的耕种,山东解放区互助组织覆盖了全部农户的21.3%(申富强,2013)。

而工业现代化的起始动因则是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后者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现代化”表述最为集中的领域。1938年,抗日战争严峻之时,毛泽东、朱德分别撰文主张建立正规化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在分析双方实力时也指出:“现代化没有铁路,就等于黄牛拉汽车,炮兵怎么办?吃饭怎么办?都解决不了”(刘伯承,1992)。为此,党在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开展工业化的初步尝试,建立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率先支持军事工业和国营重工业的发展。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煤炭、橡胶、砂金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分别增长至1946年的7.4倍、25.3倍和398.0倍,国营工厂职工人数上升近10倍(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委会,1988)。党在革命时期关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举措,不仅是初步开拓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也在实质上奠定了新中国初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格局。

3. 构筑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图景

在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化构想,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键的历史问题,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他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

会主义阵营,都不允许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现代化基础又阻碍了社会主义方案的推行,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阶段则是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毛泽东,1991a)。在此后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毛泽东进一步细化丰满了上述现代化图景。

概括而言,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如下4个特征:其一,科学把握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必须“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1991a),要坚持这一方向,就要保证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成为领导因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其二,突出了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即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前,“工业化”几乎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出现于党的各类文献中,它既是实现革命胜利和民族独立的重要保证,也被视为民主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中心目标。其三,明确指出当时发展状况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显著差距。新中国成立前,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仍占据国民经济的90%，“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周恩来,2011)。这一论断实事求是地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启动现代化进程的要素。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包括没收封建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分别对应于现代化所需的土地、资本和主体要素。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设计之初就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国有、集体经济之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毛泽东,1991b),从而合力推进现代化进程。有关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种种构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得到落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化和苏化两种主流思潮中,萌发了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朦胧认知,并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尽管囿于战争形势,党关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

探索并未完全展开,但却为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阶段(1949—1978年):“中国式”的实践自觉与现代化的体系建设

1.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性方案:“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民族独立和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即通过“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摆脱落后和贫困,从根本上达到革命的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a);1957年,毛泽东在论证敌我矛盾的解决路径时,将“现代科学文化”与农业、工业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进一步扩充了四个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b);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新了对该战略的系统表述,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并首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方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1975年,上述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内涵表述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再次印证了这一阶段性方案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经济建设的主线意义。

与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方案相比,“四个现代化”是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和描绘,并呈现出不少新特征、新气象。第一,“四个现代化”是现代化方案从革命语境到建设语境的转型。在前者语境下,现代化既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和目标,也是与旧有的资本主义秩序抗衡的理论武器^②;而在后者语境下,现代化不是一场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斗争,政治话语中的“敌人”“朋友”都可以成为学习效仿的对象,“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1994)。仅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就接收了苏联专家近5000人,领域广布于工业、农业、商业乃至行政管理(沈志华,2015);1957年,仅南

京图书馆就订购了来自英、美、法、德、苏等各国科技报刊近600种(南京图书馆,1957)。有关经济建设与科技进步的知识迅速更新了中国的现代化观念,孕育了一批本土化的现代化人才。

第二,“四个现代化”始终以工业化统领,但突破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历史成见,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外延。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保卫新生政权和积累生产资料的现实考虑,工业化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如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要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a);工业化最初也被列为“四个现代化”之首。但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多个场合被强调和更新,特别是鉴于片面强调工业化在经济实践中带来了部分负面的影响,现代化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扩充。20世纪60年代起,在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中,“农业现代化”被置于“工业现代化”之前,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党对现代化内涵的反思和重构。

第三,“四个现代化”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更具体、更客观,中国式特征更鲜明。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既肯定中国已有资源禀赋对现代化的助力,也不否认当时与现代化理想图景的巨大差距,正如毛泽东在会见英国代表团时坦诚的:“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a)。为彻底摸清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自1950年起,国家统计局先后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工农业总产值调查、劳动就业调查等,并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统计和管理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2. 从“以苏为师”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之后第二个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难题,即依附式发展和独立式发展的抉择。这是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悖论,即无法舍弃对前宗主国的依赖,造成现代化与独立性无法兼得(辛向阳,2021)。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形势下,中国虽然选择了

“以苏为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并据此接纳了苏联的低息贷款、工业原料和156项援建项目,却始终遵循了订立公平合约、发展独立双边贸易的方式,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党的认知非常清晰,“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b)。

独立自主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选择,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外部因素看,与先发现代化国家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同时“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b);而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协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致使全国250多个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③,也从反面印证了党的领导人的前瞻性判断。从内部因素看,早在1949年,中国人口就达世界总人口的21.66%,贫困人口占世界总数的40%以上(徐勇、陈军亚,2022),依附式的发展道路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启了以产业自主、科技自主和国防自主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在产业方面,中国在“以苏为师”成功完成一五计划后,通过自主开展三线建设,显著调整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和轻重布局,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约占当时全国的1/3,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加工工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产业体系趋于完整健全,具备了较强的自给能力。在科技方面,探明了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资源储备,并建立起适合中国资源条件的钢铁工业系统和农业机械系统;攻克了飞机、汽车、精密仪表、电解铝等行业的技术瓶颈,突破了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科研受阻、生产停滞的窘境。在国防方面,通过中央专委等专门机构的集中牵头,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优势,成功开发“两弹一艇一星”(路风、何鹏宇,2021),为实现其他各方面的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仅就现代化的发展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贡献已不可磨灭。1949—1978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长至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近65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5%,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④。但其更为深

远的意义在于,将“独立自主”的思想内核深嵌于此
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使其具备了切实的物质
基础和实践经验。

(三)建构阶段(1978-2012年):“中国式”的话语
自觉与现代化的制度革新

1.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性方案:
“小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
中国的现代化重新成为党的主线任务。1978年,党
和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出访51个国家,邓小平亲自
率团出访日本、新加坡等国。此次出访高潮迅速更
新了中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及自身所处位置的认
知,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改革开放决策。1979年3
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
表团时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
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
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2004a)。时隔两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再次提及“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该词在党内的第
一次正式表述。同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
芳时,邓小平首次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之
家”相挂钩,更具象地呈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其他
国家特别是先发国家现代化之间的显著差异。

从经济指标的绝对量而言,这一时期提出的“中
国式的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目标”的权宜之举。
邓小平选择“小康”这个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表
述,也是为了区别于“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他曾直
言:“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
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
点”(邓小平,1994)。这既是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再
次陷入浮躁盲目、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也是充分考
虑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
距。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1.8%,城乡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元和134元,农村居民贫
困发生率高达97.5%^⑤。在此情形下,党实事求是地
摒弃了前一阶段的“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表述,并将经济指标
的重心从钢铁、粮食等工农业产量指标调整到人均
收入这一更贴近民生的指标上来。1979年,在对比

欧美国家数据后,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定义
为“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邓小平,
1994);在此后两年间,通过对陕西、河南、四川等地
的实地考察,他意识到1000美元对中国现状仍有困
难性,将“小康”标准再次下调为800美元(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2004b)。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
将“小康”作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开启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

2. 实事求是的现代化路径:细化方案、扬长避
短、循序渐进

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这
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呈现出“实事求是”的典型
特征,总体上表现为人均收入目标的制定切合实际,
并在实践中表现为如下3个具体方面。

一是细化方案,将总体目标与市场主体的具体
情况相结合。降低总体目标,不等同于降低实践标
准;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要全力以赴,抓得
很细,很具体,很有效”,“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
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
每一处边角”,“要把原有的生产能力用好”(邓小平,
1994)。在国家财力有限、改革经验不足背景下,
这一时期推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实行“经济民
主”、放权让利,通过倾斜性政策、法规等特殊的公共
资源^⑥而非直接的物质补贴,激发市场主体的首创
性。在党政关系上,将党委下设的经济管理部门逐
步移交各级政府,减少党对具体经济事务的直接管
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
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
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党不应当包办
代替它们的工作。”在央地关系上,以“分灶吃饭”的
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地方的财权、事权,并
逐步授予部分省、市一定的经济立法权限。在政企
关系上,厘清政府和企业乃至市场的界限,将政府角
色从微观决策的主导者转变为宏观政策和规则资源
的提供者。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要求:“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
管理经济的职能。”这一时期,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
被置于格外重要的地位,“莫等上级拿办法”成为当
时颇为流行的话语创新。

二是扬长避短,从中国的禀赋优势出发制定现代化战略。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扬长避短才能多快好省》,提出中国的禀赋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劣势在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认真研究自己的特点,发挥我们的长处,避开我们的短处,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在此后三十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基本延续了扬长避短的发展策略,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充分释放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红利,打造“世界工厂”,并在国际竞争机制下倒逼技术、人才等新型比较优势的形成。1992年《全国对外经贸进出口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发布,旨在实现外贸优势从“以价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1999年,外经贸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科技兴贸行动计划》,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截至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客观上说明了基于动态禀赋优势制定中国式发展战略的科学性。

三是循序渐进,全面充实现代化的内涵布局。“中国式的现代化”在提出之初确有降低目标、单一化标准的考虑,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断提升质量、丰富内涵。1987—2002年间,在党的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现代化”一词的提及频率均不下40次,且逐渐从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拓展到服务现代化的政治体制、面向现代化的文化、适应现代化的劳动者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摆在了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正在走向重创新、重质量、重均衡的发展道路。现代化目标的提升,与两个“三步走”战略密切相关。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战略立足于“小康社会”的阶段性重心,明确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而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进一步细化了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三步走”战略以阶段性目标分解长期任务,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自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三十余年,是

中国式现代化从尝试、摸索到步入正轨、自主建构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不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⑦,更提供了符合国情、极具特色的体制机制,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好了准备。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历史性超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也开启了历史性超越的新阶段,这里的“超越”不仅是超越了自身在萌发、探索和建构阶段的历史,更是超越了历史上的已有现代化范式,具备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和特征。

(一)在水平上:从低位追赶到高位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超大经济体量、庞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中国仍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创性成就和阶段性飞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蜕变。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十年间提升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年超过1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全国市场主体达到1.54亿户,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⑧。除经济领域外,中国在生态建设、民生保障、城镇化建设等各方面成就也为世界所公认。中国凭借后来居上的迅猛势头和一枝独秀的实践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更是具有持续生命力的。

就学界既有研究而言,“现代化”一词通常指代两种意涵,其一是“过程概念”,即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历程;其二是“状态概念”,即人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理想状态的构想和定位。就过程概念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进程,各国只有进入先后、主动与被动之别,没有在场与不在场之分。正如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中扮演的角色,“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2014)。从这一角度观之,中国自近代以来各阶级的救亡方案都可被视为现代化的一部分,

这是“现代化在中国”。而就状态概念而言,现代化必定是“在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被积极地占有并且巩固地形成基础的地方才会真正出现”(吴晓明, 2021),它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被开除球籍的风险”,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建构阶段“降低目标”的权宜和妥协,而是在逐个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方案、取得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后,对历史经验的适时总结和对广阔前景的展望。

从一定程度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低位追赶到高位引领的转变是根本的、最关键的,是其他各层次成就和转变的基础与前提。这种转变当然是自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积累的结果,但也正是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时点,中国真正完成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

(二)在路径上:从“先破后立”的老路到“破立结合”的新路

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现代化国家一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标杆,许多后发国家不仅在现代化的成果上向其看齐,甚至在路径上也与其如出一辙。但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具有典型的“先破后立性”,即通过牺牲和损害社会大多数群体、其他方面的发展,实现个别群体、单方面(主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发展,甚至走向了为生产而生产、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在历史上,则具体表现为资本垄断群体与无产者的贫富分化,片面强调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追求的“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以20世纪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以及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源和发展权利的侵占。

这种“先破后立”的老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发优势的庇佑。在自然条件上,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起步的,这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承载力约束远远没有触及上限;在社会条件上,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地理大发现日益拓展、全球化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为其集聚资源、开拓市场、转嫁人口和环境压力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对后发国家而言,特别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这种老路已不再可行。

在此背景下,自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一条“破立结合”的新路,换言之,即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处理了以下4组关系: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将生态环境本身视为重要的现代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九大先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继顶层设计后的一次全面部署;2020年,中国向世界做出实现“双碳”目标的承诺,充分展现了大国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2012–2021年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6.4%,相当于节约14亿吨标准煤的使用;累计造林面积达9.6亿亩,占全球人工造林面积的四分之一;连续30余部法律和行政法规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严密的制度基础^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专辟“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节,对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做出新规划。

第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先发国家至今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的事实表明,社会的发展成果不可能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自发惠及全体民众。1975–2012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47%的收入增长份额,而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同样超过了20%(基利, 2015)。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潜藏在不同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和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症结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继续向纵深发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集中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得到了更广泛和均衡的共享。针对城乡差距,我国实施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使近1亿贫困人口步入共同富裕的行列,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2年的2.88缩小至2021年的2.50^⑩;针对区域差距,进一步推进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并创造性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雄安新区建设目标;针

对不同群体的差距,着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2021年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突出强调了“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仅2020年就导致全球超1亿人口返贫^①的背景下,我国减贫成就并未出现倒退,充分证明了推进共同富裕机制的稳定性、有效性。

第三,人与自我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导致的人的异化和单向度发展一直饱受批判,中外学界普遍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并非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两者的前提和基础(英格尔斯,1985)。我国“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以来,我国一方面通过持续提升生产力水平,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互促,实现人与自我、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统一。在思想引领上,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扩展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的精神贫困问题。202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3%,较2012年提升了1.07个百分点^②。在智力支持上,教育经费投入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输送了大批具有宽厚基础、专业素养的劳动人才。在社会氛围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升华、价值凝聚、观念落地,显著提升了公众对中国特有的现代化模式的认同、理解和参与,有效地消化了改革中的成本和阵痛。正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中的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也是每一个人对自身价值、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促进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文化氛围的形成。”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有的主流理论往往将西方现代化的成就归因于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却少有提及其在殖民贸易中的巨大收益。据统计,1500—1750年间,西方国家从殖民地获取的收益高达十亿英镑以上,甚至超过了1800年欧洲所有使用蒸汽动力的工业企业的资本总额(曼德尔,1979)。但他们并未将现代化的红利留给殖民地国

家,反而加剧了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分化,拉美、非洲等地区现代化的停滞即为明证。而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新时代以来,更是实现了从“做好自己的事”到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刻转变,有力地助推了世界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崛起。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本身已经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2013—202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6%,远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③。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先发国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循环,始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和红利。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项目或常设机构,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持续提供公共产品。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和共享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特征论述中,除第一个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侧重于对初始禀赋^④的描述外,其余4个特征均侧重于对发展质量和成效的描述,并分别对应于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聚焦的上述四组关系。中国凭借“破立结合”的新路,实现了有益于自然、社会、他国和人类自身的现代化,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光明前景。

(三)在方法上:从局部管理到系统治理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我国提出的“第五化”概念,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又一个重大跃迁,即推进现代化的方法从局部到系统、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所谓从局部到系统的转变,即是从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升国家治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可能性上,系统治理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要求的统筹安排,这必然以现代化的内涵

拓宽和发展均衡为基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两个阶段性方案即“四个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可知,此前我国主要依据经济指标来确定目标参照;而随着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新时代的到来,经济现代化逐渐向社会其他领域发展渗透,并形成了各子系统之间密不可分、协调共进的样态。从必要性上,我国过去发展中的部门主义、地方主义、政出多门等问题,暴露出了治理碎片化带来的短视和失灵(俞可平,2014),已不适应当前产业体系加速调整、全球市场加速整合、数据等新要素加速流动等发展新态势,更无助于冲破旧有利益藩篱、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将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

所谓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则反映了我国在治理理念和制度上的重大革新。“治理”一词并非西方独有,而早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出现。《隋书》有言:“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作为与“乱”相对的概念,“治”或“治理”反映了古人对良法善治的朴素构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思想渊源。而在现代社会,与“管理”概念相比,“治理”往往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手段的非强制性、规则的客观性和结果的高效性。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此前的现代化探索和建构历程中,党和政府已积累了足够的治理经验和智慧,锻造了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已实现加速成长,具备了协同治理的意识、主动性和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习近平,2018)。自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党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方式,并随着时代需求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革新理念和方法。新时代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价值整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动力和基础。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实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

亨廷顿曾在对比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后指出,

“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且一党制较之于多党制更趋向于稳定(亨廷顿,1989)。而与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对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完成了切实而成功的探索,打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并成为此后现代化进程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历史生动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91b)。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中,党一方面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政策延续性与理念创新相结合、长期规划与短期政策相结合,取得了实践层面的重大成效;另一方面通过将现代化的共性规律融入个性的发展条件、禀赋和所处环境,显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完成了理论层面的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深度阐述,再次说明了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党的领导还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完成了工业体系和布局的完整建构,实现了科技自主和国防自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前提下,实现了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从计划到市场的重要转变;在新时代,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和改革深水区的更高要求,如期完成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主要目标任务,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助力全球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一根本方向的正确性,使中国真正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附,打破了诸如“现代化必然招致动乱”的悖论,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证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远大前景。

(二)坚持人民首创和人的现代化本质目标相促进

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既是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持续拓新的动力源泉。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劳动互助社、大生产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枫桥经验”,从改革开放中频频涌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三来一补”等创新模式,到新时代“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2019)的民营经济和双创主体,无一不展现出人民群众在形塑现代化之“中国式”过程中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之初,党就深刻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1991b)。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第一手信息和经验,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扎根国情、凸显特色、永葆生机的重要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持续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根本上在于党始终以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旨归,将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作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衡量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逐步实现了中国千年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理想,极大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和归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下,中国仍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率先建立起城乡公共医疗体系、义务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典型呈现;改革开放时期,党带领人民彻底告别了物质短缺的窘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被写入党的先进性的衡量标准;新时代以来,党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通过着力扭转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重大考验面前切实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和尊严。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保证了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创造、由人民共享。

(三)坚持战略目标和底线思维相统一

战略目标与底线思维的统一,本质上是在立足最低目标的前提下争取最高标准。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依据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分别确立了最

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和反帝反封建。面对现代化这一复杂性、风险性极高的发展历程,党同样遵循了战略目标与底线思维并立,统筹发展与安全。回溯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历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始终的最高战略目标,而在不同时期先后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则是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既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阶段具备的初始条件和基础,也反映了其向更高水平、最高目标的收敛趋势。

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底线思维主要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三方面保证。一是原则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极端困厄的外部封锁中探索出来的、在科学社会主义面临巨大挫折的背景下建构形成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超越既有范式的,在外部环境的重重考验下,中国始终没有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1993),这一原则底线是一切现代化实践的前提和“中国式”的根本立足点。二是托底保证。无论是新中国初期应对周边紧张局势、备荒备战的“三线”建设,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一系列积极举措,都反映出底线思维历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稳中有进、化危为机的重要支撑。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多个领域提出了守住经济增速底线、粮食安全底线、稳就业底线、生态红线等要求,牢牢把握住了应对危机的主动权和战略基础。三是动力保证。经历百年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不应就此忽视其显著的提升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习近平,2018),就是要聚焦于发展现状中潜在的问题、缺陷、劣势,在补短板、强弱项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和韧性。

(四)坚持独立自主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相融合

对于后现代化国家而言,借鉴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和路径看似有助于降低探索的成本,但从20世纪以来世界的现代化浪潮来看,那些过度模仿甚至照搬他国经验的后发国家往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拉丁美洲为例,自19世纪末期至今,该地区已

先后经历了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外向发展战略主导的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或经典理论为蓝本,在遇到外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向另一个极端的“钟摆式”运动(苏振兴,2006)。而中国却始终以独立自主为根本基点,基于对自身优劣的深刻认知,在现代化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的真正意涵,“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2021)。

独立自主并不是一味强调自身独特性、忽视世界发展趋势。早在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中,时人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之于世界历史的不可阻挡性,“只有向这条大道前进,始能消减‘生产手段’与‘生产制度’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生的一切怪状”(周宪文,1933)。世界发展大势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必要性和必然性,也是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循。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领导人敏锐意识到当前世界的主题已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因而将此前用于保护新生政权、战备需求的资源逐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了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战略布局;再如新时代以来,即使面对世界局势的动荡和部分国家“逆全球化”的阻挠,我国也坚持将经济全球化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通过积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习近平,2017),在广阔的全球视野下培育新的增长动能。通过深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明确了自身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和角色,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发展高地。

五、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实践展望与理论构建

(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维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党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成就,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还需格外聚焦如下3个方面的实践举措。

其一是把握好长期发展和短期任务之间的张

力。现代化如同一场世界范围的“马拉松”(何传启,2018),各国的发展位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自20世纪50年代的后发现代化浪潮启动以来,发达国家落后、发展中国家反超的概率分别为10%和5%。因而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特别是长期目标与短期任务在一定范围内的张力和资源竞争。在财富创造上,表现为长期生产潜力与短期波动压力之间的张力。近年来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不利的宏观环境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较大压力。相较于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我国宏观调控工具箱更趋系统化、精准化,逆周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调控政策可能的冗余和时滞,更重要的是凭借最小的调控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强市场主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不应为追求短期效力而牺牲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在财富分配上,表现为长期趋势与短期福利之间的张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但这注定需要较长时期的调整乃至纠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收入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福利水平提高必须建立在经济 and 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为此,既要保持对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向好的信心和耐心,通过深层次体制改革推进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又要借助示范区试点、反垄断、财税改革等方式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其二是进一步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机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不断提升供给侧的质量、安全和效率。一是持续增强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从“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系列举措入手,不断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势和多层次市场需求的创新产业,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高度重视当前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断链、短链等问题,着重布局一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上下游产业的配套建设和空间集聚,不断提升供应体系的韧性和稳定性;三

是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着力推进“卡脖子”技术的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释放需求侧的潜力和驱动力。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在4亿人以上^⑤,相当于欧盟或美国的全部人口。要充分发挥这一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根本举措是要持续推进收入分配、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需求侧的整体购买力;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消费主体营造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此外,还需要格外聚焦当前流通领域的瓶颈和堵点,以城市群、都市圈和县域经济体系为基点,补齐城市边缘、城乡结合区域的流通短板,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其三是提升引导和利用资本的能力,不断超越资本的现代性。与既有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创举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我国当前仍需进一步发挥资本的积极属性,探索其特性及行为规律在新时代的理论 and 实践意涵。具体而言,在制度层面,要着力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疏通直接融资渠道,为资本的良性运行释放空间。在规则层面,要致力于形成统一、公开、稳定的市场规则框架,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形成事前预判、事中应对、事后追溯的全流程动态监管机制。在立法层面,要密切追踪资本与前沿技术、数据要素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立法,及时弥补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法律空白和漏洞。在意识层面,通过行业协会、企业家联盟等组织,积极引导资本运行与现代化强国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加强舆论导向和理论创新,不断超越资本的现代性。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维

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而言,现代化理论的出现都滞后于实践。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理论研究高峰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远远晚于其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这是由于二战后的许多新独立国家亟须开展现代化建设,加之在两极格局下,为扩大盟友阵营、配合经济援助计划,大批西方学者投身于现代

化理论的构建。因而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指导”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其基本特征是:将西方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一般化,归纳为现代化建设的普遍经验;将西方现代社会的典型制度、特征一般化,描绘成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归宿。但实践表明,自二战后至今,依据发达国家开具的“药方”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寥寥无几;而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及休克疗法造成的地区政局动荡和经济下滑,也反面印证了现代化理论的不可移植性。

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罗荣渠的“一元多线”论、章开沅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日益突出,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顺利转型、逆势增长,更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彰显了加快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应至少包括如下3个层面。第一是学术概念层面。概念和术语是理论构建的基础材料,同时也反映了构建者对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中心任务、典型特征的深层判断。例如,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聚焦于“资本”的现代性特征,并由此推导出世界市场、现代文明等趋势,乃至资本拜物教、异化劳动等批判;而以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为代表的欧美现代化理论则将现代化的过程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落后国家进入更高序列的推力则被细化为投资、储蓄、劳动增长等要素。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的实践历程中形成了大量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概念,既包括新民主主义、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等对现代化目标的总体论述,也包括“两个一百年”“三步走”“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现代化实现路径的描述,还包括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着重于现代化经济维度的举措。但就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些术语的学理性解读虽然形成了阶段性的热潮,却未构成递进的理论发

展脉络,对术语间的异同、因果等逻辑关系和层次框架缺乏足够的系统化论证,这应成为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

第二是指标度量层面。持续完善现代化指标度量体系,不仅是出于结果评判目的,增强现代化发展状况及特征的可度量性、可比性,也有助于设定过程性目标,基于指标的动态监测确定现代化的前瞻性发展方向。目前学界基于现代化的一般过程,已经确定了较为丰富的指标体系(英格尔斯,1985;布莱克,1989;洪银兴,2014b;何传启,2020);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统计局等部门也联合制定了《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5大类16项指标,为当前构建和完善现代化的新型指标体系提供了参照。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应该既反映现代化发展的共性,也应该格外凸显中国式的特殊性(韩保江、李志斌,2022),特别是将新时代以来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并纳入定量评价体系,进一步增强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研判和预测能力。

第三是话语体系层面。与学术概念相比,话语体系的受众更广泛、传播性也更强。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占据主导,而我国的话语体系建设与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并不完全匹配,以致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现象,造成了对中国式的曲解和他国的误解(郑永年,2012)。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在内容上更趋科学性、系统性,形式上更加形象生动、开放融通,为树立胸怀天下的大国形象、传播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做出了成功探索。在未来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应进一步推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出发,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思想渊源;推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思路和做法,及时总结和提炼为理论成果;推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的形式和媒介平台,提升对外表达和延伸的精确性、可接受性,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与意涵^⑩。

注释:

- ①根据人民出版社编辑(1983)和陈独秀(2013)整理而成。
- 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理论文献中,这种斗争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33年,党在号召全体国民反对第五次围剿时提出,“英帝国主义使广东的反动军队更‘现代化’”(中共中央书记处,1981),讽刺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的装备支援。
-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9)。
- ④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
- ⑤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 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凡未明确私人占有的资源,包括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资源,都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参见洪银兴(2014a)。
- ⑦参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 ⑨参见国家统计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引领绿色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
- ⑩参见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 ⑪参见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 ⑫参见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 ⑬参见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 ⑭从另一角度观之,能够使如此大的人口体量整体迈入现代化,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化高水平的反映、高质量的结果。
- ⑮关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算问题,既有研究所用指标及方法众多,测算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数据来自《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22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再次认可了这一测算结果。
- ⑯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基利(Keeley)。

参考文献:

- [1]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 [2]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5]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委会编辑:《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6]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7]谷春帆:《中国经济改造的实现方法》,《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8]郭晗、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实践历程与路径选择》,《改革》,2022年第7期。

[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0]韩保江、李志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11]何传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分析》,《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3期。

[12]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2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13]何二龙、孙蚌珠:《土地、城乡关系及中国式工业化》,《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1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1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16]洪银兴:《关键是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红旗文稿》,2014年a第3期。

[17]洪银兴:《区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b。

[18]洪银兴:《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

[19]胡鞍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0]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21]李达:《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2]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23]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7期。

[24]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25]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

[28]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廉佩直译,商

务印书馆,1979年。

[2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a。

[3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b。

[3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c。

[32]毛泽东:《中国和外国关系》,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33]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近一年来为科学研究服务概况》,《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第3期。

[34]人民出版社编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申富强:《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前夜的执政准备》,《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36]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37]苏振兴:《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

[38]王灵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39]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40]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4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

[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43]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4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45]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46]谢绍武:《农事试验场的初步工作》,《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

[47]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影响》,《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5期。

[48]徐勇、陈军亚:《国家善治能力: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49]燕连福:《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内涵扩展和未来指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50]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

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51]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52]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53]张来明、侯永志:《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历程》,《管理世界》,2021年第10期。

[54]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方式》,《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55]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56]赵士发:《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6年。

[57]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

[58]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a。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b。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a。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b。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a。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b。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6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编著:《中国科技发展70年:1949-2019》,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

[69]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70]周文、肖玉飞:《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基本经济制度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71]周宪文:《本其所信埋头苦干》,《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72]Keeley, B., 2015, *Income Inequality: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aris: OECD Publishing.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ang Yaguang Bi Yue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n active choice with grea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strategic foresigh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emergenc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has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to 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a historic transcendence in the new era and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level from catching-up to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h from "destruction before construction" to "destruction while construc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ethod from local management to systemic governance.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attributed to four combinations, which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people and the essential goal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strategic goals and preparation for worst-case scenario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to the global trend. In the future, to create a new real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guide and utilize capital in the practice.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ncepts, indicator systems and discourse system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oration; practical experience